

分阴集

繁星

北京出版社

I262.2/14

7/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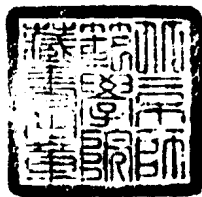
分 阴 集

繁 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6133



北 京 出 版 社

726133

分 阴 集

繁 星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2 插页 65,900 字

1979 年 6 月第 1 版 197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书号: 10071·249 定价: 0.29 元

再版前言

蒙冤十多年的《三家村札记》得到平反昭雪，出版单位接连来通知：不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等等都将出版，而且连我在一九六二年出版过的一本小集子——《分阴集》，也将重版；北京出版社的同志还特意到医院来叮嘱我，叫我为重版的《分阴集》写个“前言”。听到这些消息，一时思绪万千，惊喜、悲伤和惶愧交集于心，提起笔来竟不知从何处写起。使我惊喜的，当然是“三家村”的沉冤得到昭雪，感谢党，感谢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引起我深深哀痛的，是“三家”中的两家——邓拓同志和吴晗同志，都在十年以前就惨遭迫害，先后含冤而逝！我所惶愧的，倒不是由于“四人帮”的毒骂、诬陷，心存恐惧，犹有余悸，而是我那几年在《分阴集》和《三家村札记》中所写的那些杂文，自己并不满意，当初发表于报刊和收集起来出版，本来就已感到惶愧；现在遭逢一场大难之后，还不自行收敛，又拿出来重版，未免缺少自知之明。

但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竟是如此”（列宁）。客观

世界的发展，并不由某些个人自作主张，它有一条铁的规律，即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所常常称道的“历史辩证法”或“客观辩证法”。十多年来，这条铁的规律反复不断地教训着我，使我至少懂得了这样一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是顺从着、也都得顺从着它的轨道前进；不如此，那便将自寻苦恼，自讨苦吃，是不是真正懂得、而且真能掌握这条铁的规律，对于个人的得失荣辱倒还事小，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革命事业的成败，却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正因为有这样一点感触，我虽然仍旧把我所写的一些文章视为“弊帚”，但也不能不同时把它作为“历史资料”，让它重新出版，提供给那些对这十几年来来的历史遗迹有回顾兴趣的同志们作考证材料。虽然它只不过是一场大火剩下的余烬，但其中颇有几篇曾经是这场大火的引火之物。

既是作为“历史资料”保留下来，那就得保持它的历史真相，保持它本来的面目；所以我除开校正一些错字和标点符号，改了一个原来不很贴切的题目（《蓝与青之间》改成《师生之间》）、抽去一篇不合时宜的短文以外，其它文字、内容等等都一概不动，保持原状。其中的错误、缺点或不足之处，读者自会明辨。因此我还把一九六二年第一次出版时没有编入、以后受到“四人帮”诬陷的《有鬼无害论》全文补在篇末。因为这也是“历史资料”，不

可缺少。

整个集子不过三十多篇短小的杂文，论分量实在轻而且薄，大都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春夏间在几家报刊上发表过的短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前线》的专栏——《三家村札记》中发表的。在收集成册时，我没有完全按发表日期的先后编排，而是按大体内容分编为几组。其中有十几篇是谈教育、教学、师生关系等等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之前，我作过几年教育工作，一九五九年以后虽然身已离职，而心却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读书、看报、所思所想的，总还是那些人和事，每一提笔，就不知不觉地写出这些内容来了。文章只有一篇是讽刺敌人的，即一九六一年的秋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焚尸灭迹，我觉得很气愤，就引一段故事写成《怕鬼的雅谑》，用来讽刺他。无奈当时还不许在报刊上随意点名批修，所以用隐晦的写法。虽然文内有好几处暗示这是“实事”，是“新闻报导”，又把赫鲁晓夫的形象和性格隐藏在故事人物中，但终究使人们看不懂，而又被别有用心的人诬指构陷，成了我的“反党”罪状之一。还有几篇，是逢年过节的应景之作，虽也包含一些鼓舞生产劳动的意思，但也并无深意，明白易晓。可是其中一篇《腊鼓催春小记》竟被文痞姚文元看上眼，特别挑出来，罗织到他的《评“三家村”》之首，说这是“三家村”“认为进攻的时期

已到”、“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实际这篇小文章是一九六一年一月临近春节时发表于《北京晚报》，同年的十月，《前线》才开辟专栏《三家村札记》，相隔达八、九个月之久；我写这篇小文章时，连“三家村”的影子都远远没有出现，谁都想不到有个什么“三家村”，而文痞居然能把前后相隔这么遥远的时间、发表于两个不同报刊的东西，生拉硬扯到一块，横蛮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流氓痞棍之态可掬。最后就是《史和戏》、《有鬼无害论》两篇，这是“遂使竖子成名”的虽小犹大的文章，我不想对两文的内容多作解释了，留待读者去评论罢。

廖沫沙

一九七九年三月于北京

目 录

再版前言.....廖沫沙

《师说》解..... 1

“孔之卓”在哪里？..... 5

不叩亦必鸣.....10

“蒙以养正”说.....14

小学生练字.....18

还是小学生练字.....21

郑板桥的两封家书.....24

“教然后知困”.....27

跑龙套为先.....30

志欲大而心欲小.....33

师生之间.....37

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40

群众路线的“敲门砖”.....45

从“无数”到“有数”.....51

亲闻，亲见，亲知.....56

要学走路，先学摔跤.....62

怕鬼的“雅谑”.....65

“长短相较”说.....	68
科学话同科学事.....	71
死了的“科学”.....	74
药也会变么?	77
且谈收与藏.....	80
有帐必须算.....	83
辩论“穷棒子过年”.....	89
这并不是私事.....	92
“今朝有酒今朝醉”.....	95
浪费与剥削.....	98
劳动万岁	102
“腊鼓催春”小记	105
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108
“史”和“戏”	111
有鬼无害论	115
后记	119

《师 说》 解

年过五十的老先生，大概总读过韩愈的《师说》。这篇文章中很有几句话值得今天当老师和学生的想一想。

例如他说：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原意，是因为自己接受了门徒，为了抵制当时舆论的非议，所以写这篇文章自解。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是作了老师，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他，人们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本来，只要是一个人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吾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武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认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求学的人听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给“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们听。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

理，并不是瞎说。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什么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过老师。这也是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老师和学生可以互相转换：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老师也有需要向学生学习之处。

《礼记》的《学记》有一段著名的话，意思也和这相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说命’曰：‘教学半’。其此之谓乎！”《礼记》的话着重在自反自强，不如韩愈说得更彻底。但是它所说的“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所引的“教学半”（就是说教学各居其半，相反而相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

做先生的必然同时做学生，或者首先做学生，象马克思所说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个道理说来很浅显，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很不容易承认。特别是当老师当久了的人，或者象韩愈所说的“术业有专攻”的人，就很不容易接受这点辩证法。

老师们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倒也事出有因。“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虽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韩愈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封建时代却并不

通行。正好相反，“天地君亲师”，在封建时代，老师是同“天地君亲”在一起，居高而临下，弟子哪里能同老师上下平等而又矛盾统一呢？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弟子毕竟是弟子，怎可以超过老师？这个观点相沿成习，直到不久以前，还有许多人没有料到千古以来的老师和弟子，会有一个伦常大变的时候。

新的师生关系，倒真象韩愈所说的，是“不耻相师”。就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真正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

当然，学术思想批判和教学改革，是应当有方针、有目标的，方针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目标是提高学术和提高教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改革而改革。从学生方面来说，应该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尊重真理的精神；从老师方面来说，也应该象孔夫子那样，有一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雅量。

韩愈援引孔子的先例，作出判断说，“圣人无常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聪明有学问的人，没有一定的老师；见人有学问，不管是谁，就认他为师。我想还得给他添一句：“师亦无常道。”就是老师讲的并不经常等于真理。一个当老师的人，既要勇于坚持自己的真理，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非真理。只要能作到这样一点，他就是“常师”和“真师”了。要保持师位的，不妨试一试这条方案，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

在另一方面，当学生的也应当了解：既然师和弟子的关系并不以师必贤于弟子、弟子必不如师为条件，那末，今天的学生在看到老师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以后，也就不应该马上得到结论说，老师再不能作老师了。某一方面的短处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短处；反之，某一方面的长处也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长处。即使把学生和老师换个位置，对于比自己多一些知识的人也仍然应该“不耻相师”。何况位置还并不能互换；何况今天的学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更应该深切地认识自己知道的还很有限，还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呢！

这就是我的《师说》解。

195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孔之卓”在哪里？

前些时，马南邨同志在《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谈到“颜苦孔之卓”这个典故。初看题目竟然不懂，再读全文，才知道是出自扬子《法言》；还以为这不过是扬雄的随意渲染，没有什么根据。事后一想，读书不能这样不求甚解，忙找来一本《法言》，把“颜苦孔之卓之至也”的前后文反复看了几遍，却始终想不出这句话的根据何在。可笑得很，自己读过的发蒙读本，竟至忘得这么干净；打开《论语》，寻到《子罕第九》，所谓“孔之卓”，却赫然在目。原文如此：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苦孔之卓”，原来就是“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引申出来的。孔子站立得太高了，颜渊想跟也跟不上去，此其所以叫“苦”也。这位弟子对老师真可说是五体投地，佩服得比天还高。至于当老师的孔子

呢，对颜渊也爱之至极，“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地赞不绝口。——这都是有名的故事。“颜苦孔”，“贤哉回”，师与弟子正好是一对：一个尊师，一个爱徒。

“颜苦孔”的理由，就在“喟然叹曰”中可以找到线索：“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使他这个弟子“欲罢不能”。颜渊崇拜孔子的，当然不止此一端，但是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确实值得人们的崇拜。人要真正能作到这两点，就颇不容易。“贤哉回”的理由，孔子也作过这样的解释：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无），未闻好学者也。”

很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把“好学”和“不迁怒，不贰过”联在一起，似乎好学就离不开“改过迁善”。比如他还说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也是把“学”和“过则勿惮改”联在一起。孔子是个政治家（当然是封建主义的），又是个教育家，所以一部《论语》，除开讲“礼”、讲“仁”、讲“孝弟忠信”、讲“为政以德”等等，宣扬他的奴隶或封建的伦理道德观点以外，就是讲“学习”，其中还夹带着好些讲“改过迁善”的箴言。例如：“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而且他往往把“学习”和“改过迁

善”相提并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什么叫“好学”？他说：“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他这个“就有道而正焉”的“好学”论，如果要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服从真理，改正错误。这和我们所说的“学习理论，改造思想”，意义有相近似的地方。不过他和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

孔子除开强调“过则勿惮改”之外，还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就是讲话要合乎实际，要言行一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些观点，都是满有道理的。可惜的是这位“圣人”是属于“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即剥削阶级），他自己的言和信或言与行，往往不可能“一以贯之”，取得一致。一部《论语》本来是专记他的好话和好事的，但是墨子的《非儒》篇，王充的《问孔》篇，就从《论语》中揭发出他好多言而无信或言行不符的地方。但是孔子也真有颜渊所说的“卓尔”之处，如果有人当面揭出他这个毛病，他倒能承认错误。这里举他一个例：

孔子根据他的统治阶级道德观点，一向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君臣之间也一样。隐就是隐瞒，不讲老实话。这和“言必信”正相矛盾，最容易出毛病、犯过错。陈国的一位大夫“陈司败问昭公（鲁侯）知礼乎？孔子曰：

知礼。孔子退。(陈司败)揖巫马期(孔子弟子)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鲁昭公娶同姓之女为老婆，是违礼的；孔子说昭公“知礼”，显然是有意撒谎，是错误的。孔子在这里无话可说，只好承认“有过”。“知耻近乎勇”，孔子面对他的学生，倒有承认过错的勇气。

《论语》还有一个故事，也说明孔子很重视改过迁善：“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蘧伯玉)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意思是称赞这个使者说得好，也称赞蘧伯玉“欲寡其过”的不断努力。蘧伯玉大概是一位经常检查错误，改正错误的名人，庄子的《则阳》篇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也提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不管他们讲的蘧伯玉是六十岁或五十岁，总之说明了人在认识上的一条发展规律：人是不能没有错误的；人的认识是不能一次完成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成为错误；问题不在犯不犯错误，而在于孔子所说的“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那才是真正的错误。

孔子对颜渊这个弟子是赞不绝口的，但是对他也有